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从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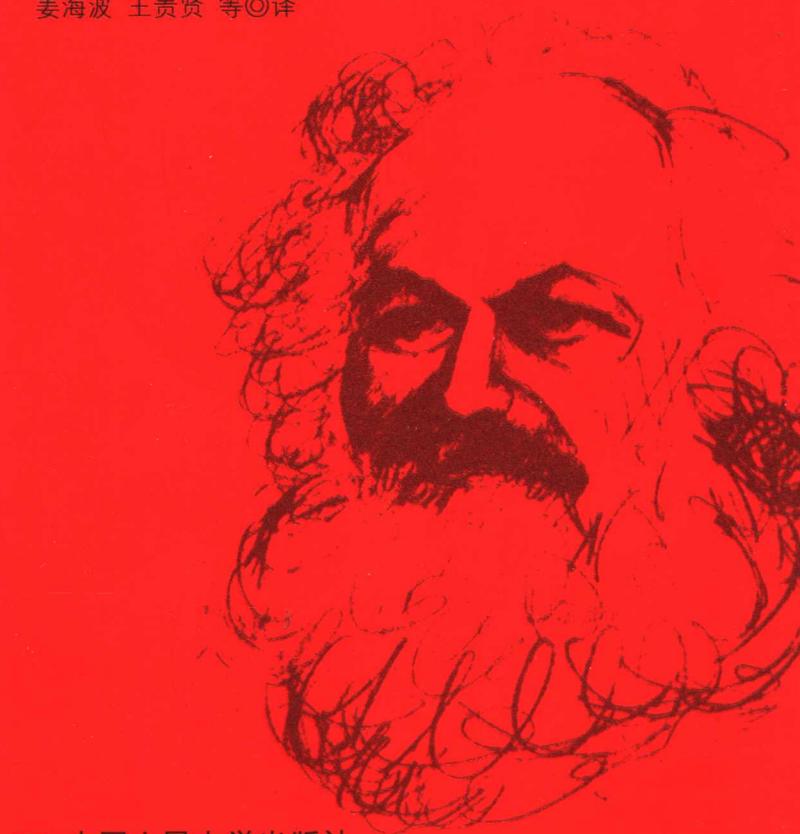


MARX & ENGELS

马克思与恩格斯： 学术思想关系

[美]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著

姜海波 王贵贤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ARX & ENGELS

马克思与恩格斯： 学术思想关系

[美]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著
姜海波 王贵贤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 [美] 卡弗著；姜海波等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9198-3

I. 马…

II. ①卡…②姜…

III. ①马克思, K (1818—1883) - 研究 ②恩格斯, F (1820—1895) - 研究

IV. A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735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美] 特雷尔·卡弗 (Terrell Carver) 著

姜海波 王贵贤 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25 插页 2	定 价	28.00 元
字 数	171 000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愿意将自己的新作纳入丛书。为此，我谨代表本丛书编委会对各位尊敬的读者、作者、译者、出版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的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实践的迅猛发展，思想理论发展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断推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2004年以来，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交相辉映，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理性。从国际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运用的普及，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如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全球社会治理、世界体系演进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国际学术界很多有识之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问题

2 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的关系、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研究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还从当代人类的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新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及其发展源流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对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为推进我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我国近几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新作，译介给我国读者。其中，有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研究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规律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未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有的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成果，如生态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等，可以给我们思考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启发。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作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08年3月28日于北京西单

中文版序言

译者序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这本书也将是一部标准的著作。遗憾的是，近 25 年过去了，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密切研究的学术界，他们的关系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学者们着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组成那些著作的文本时，并没有首先去解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以及因此而建立的解释传统。为了做到这些，也就是为了厘清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关系，正如它所是的那样，学者们需要了解这个关系是如何几乎全部被恩格斯叙述的，而且学者们需要通过谨慎关注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审视恩格斯的叙述。这个日子，并不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相遇，也不是指他们之后决定一起工作（尽管在那时他们不可能预期到这将会是“终身的”）的那次友好会面。这个日子指的是马克思去世的那天，1883 年 3 月 14 日，在那之后，恩格斯便可以更加自由地说他所喜欢的关于马克思的观点以及“我们”的观点，正像从那时起他所做的那样。因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事实所经历的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实际过程，另一次是由恩格斯建构的回顾性说明。关于两人关系的“传记”在恩格斯的叙述中也颇为不同，这取决于它是写于马克思逝世之前还是之后。在具有自觉调查意识和批判性的学术圈内，对这个恩格斯叙述的“传记”本应具有的更深一层的研究仍将兴盛。

从 1983 年至今，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虽然这些问题在其中可能被提出——仍然没有进展。关于恩格斯的两项研究（J. D. 亨利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及思想》[1991] 和 S. H. 里格比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1992]）赞成我的著作但在总体上却是捍卫传统的观点（它本身

源自恩格斯的叙述），而不是从一个独立的思考出发去追问这个问题，并由此必要地形成新的观点、新的诠释、新的分析、新的证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传统观点就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完整无缺，并且还有众多的学者（经常出于相反的原因）发现，如果那个传统战胜任何烦扰的重新解释，正像我在这本书中提议的那样，那么世界是很容易被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本身的头等问题。MEGA 正雄心勃勃地尝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写作的原初语言出版他们的全部著作（包括各个种类），辅以完整的、依据语境的注释和引用，并完全采用彻底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要求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做单独的个人和思想——除了能被清晰确定的一些特别的合著——即便如此，如果手稿中存在笔迹问题（如 20 世纪早期已经广为人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的情况），谨慎地鉴别二人的笔迹仍是必要的。此外文献学研究保证了原文的年代考证，以避免追溯、事后的聪明以及时代错误。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被恩格斯用于构建一个《资本论》第三卷的文本——在 MEGA 系列中是一部复制的文本，保持马克思遗留时的原貌，它可以与恩格斯编辑的版本进行对照；但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并非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倒退。这里存在的与恩格斯叙述的关于他和马克思的关系的论争从根本上反映了问题的弹性，我的观点是可以被捍卫的。

在这个辩护中，确切来说什么是得失的关键呢？关键就是恩格斯关于马克思观点的叙述的标志性地位以及贯穿他自己长期事业中的所作所为，这是恩格斯 1859 年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以来的叙述，是对先前时期因而具有回顾性的叙述，而且恩格斯更具有影响力的叙述是在 1883 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去世（1895 年 8 月 5 日）之前的叙述。此外，恩格斯自己著作的标志性地位在此也是关键，特别是他声称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在叙述马克思的观点，强化它们，更简要地介绍它们，补充它们，系统化它们。我说标志性的地位，因为恩格斯的著作几乎从未被作为 **恩格斯的** 著作而调查过，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著作要么被作为了马克思观点的代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马克思的著作），要么被忽略掉。忽略恩格斯的著作并没有去除那些传统的正统，马克思大部分观点正是通过这些著作而被理解；学者们必须更专注于恩格斯的著作，并研究这些著作中任何独立于马克思而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或者任何可以被依据文本和争论予以说明的与马克思著述的关联，或者任何马克思的著作能够在今天被有效解释这个方面的价值。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思想是开明的。我希望学者们能够继续研究它们。我衷心地希望这个中译本会有助于这个过程，并且我深深地感激那些为了这个中译本而努力劳作的人们。

特雷尔·卡弗

布里斯托，英国

2006年12月11日

序 言

序言

关系史本身是复杂的，思想关系史的复杂性尤甚。而我要分析的是一段双重的、交互的，并且由其中一者（在他的有生之年，作者注）回顾而得的思想关系史。本书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复杂纠葛的思想理路以及他们几乎用尽毕生心血谱写出来的家喻户晓的关系。希望附在本书最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年表对读者阅读理解本书有所帮助。

感谢布里斯托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和政治学系及此项目给予我的支持。

特雷尔·卡弗

布里斯托

1982年12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 1 章 不顺利的开始	5
第 2 章 “从另一条道路”	31
第 3 章 “我们的见解”	52
第 4 章 辩证法的发明	92
第 5 章 “第二小提琴手”?	109
结 论	139
马克思—恩格斯年表	144
声 明	148
译后记	149

导 言



在这本书中，我打算根据事实来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以便回答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次会见是不成功的？是什么吸引马克思在1844年与恩格斯确立合作关系？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有何影响？在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谁明确地阐明了什么？经恩格斯之手闻名于世的“辩证法”第一次出现在什么时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熟岁月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何种程度上做出他与马克思关系的明确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对我们阅读他们的代表作有什么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尽量避免那种太常见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的谬误。第一个是“镜像”的错误：如果注释者不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或其某部著作中的一节，马克思必然会被误解，即读者与注释者一样迷惑。太多的注释者过快地将问题归因于文本排序的错误，在文本诠释中“解决”问题。较之通常的假设而言，我更倾向于关注马克思著作本身。出人意料的是，诠释者乐于将误解归因于恩格斯，读者会发现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相当多的模棱两可之处，这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的。

第二个错误是“年代学”的或者相反。当一种理念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比如，马克思幸存下来的著作，是他第一次具有那种理念的时候创作的，或者，当马克思第一次具有一种理念的时候，他就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当这样的标注用于“证明”其成功著作的显然不同的学术语境的时候，当更有道理的心理学假设、更多对读者的全面关注以及围绕作品创作的其他环境可能导致学术理论的发展被公认为更加复杂的时候，对文本标注如此谨慎的关注竟被看做是无用的，但争论也更激烈且传达着更多的信息。对马克思文本的年代学的大量关注与对恩格斯的评论鲜有类似之处，因此我断言，多年后，恩格斯的作品会比马克思的作品更具有戏剧性的变化，他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与某个日期的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马克思逝世的时候。

第三个是关于学术发展的目的论观点的错误：很多论述认为马克思的生

涯由一系列逻辑相关的阶段组成，即浪漫主义、自由主义、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作为连续的过程直至“终结”，也就是说，马克思提到的“自我清算”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些论述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学术差别都类似于相互封闭的“小房间”，但又神奇地预设了每个“关键”文本创作的恰当的钥匙，以便打开独特的“小房间”并向前发展。

当诠释马克思早期的（以及真正成熟的）著作发展过程的重要连续性的时候，神奇的目的论是不必要的。马克思的政治兴趣及其生活环境为此提供了充足的线索，这个是他自己在自传中概要提及的。他运用了其他人的观点，绝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将他看做黑格尔主义者、费尔巴哈主义者或别的什么，他出色地拒斥了上述学派的支持者。他的深刻思考、调查研究和科学方法是他理论发展的秘密所在，他需要事实来佐证论述，从不根据假设来颠倒通常的观点。他的政治研究方法在与他所处时代的知名作家和学派的争论中大为奏效；作家和学派们没有确定什么是争论的关键环节，继而错误地认为自己完成了学术的全面质变。

令人惊奇的是，对于争论的一个更好的观点是，作家和学派们围绕着作为特定时期的思想家的恩格斯的学术研究相当有限，因为恩格斯早期的发展缺乏马克思那种专心致志的政治热情和综合素质。恩格斯有时也引起人们关于他的什么问题的出版兴趣，而且他也经过了与某些学派的门徒的相当激烈的争论，即青年黑格尔派、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因为对恩格斯的生涯没有太多的思考，没有人对他晚年成就的无限的力量有所把握。我对恩格斯生涯的观点没有其他目的，我只是要指出，他在何处确立了学术定位，这对他的思想以及他对马克思的阐释有何意义。

对于逐渐清晰的前提而言，恩格斯的个人和学术的作用，对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以对恩格斯著作的关注为第一分析要素，而以对马克思著作的关注为第二分析要素。这种对他们的关系加以明确考量甚至完全提升的做法，颠倒了思考这两位思想家及其关系的通常程序。这个关系比大多数注释者所思考的要重要得多，也只有在关注恩格斯的生活和著作的时候，才能得到恰当的梳理。

从广义上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注释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没有一个是本书所支持的。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完美的合作者，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是一致的。此外，他们是互补的和/或可交换的著作的作者，这些著作反映了他们某些相同的兴趣以及他们的写作分工。一种文本阐释反驳这样的观点，特别是在小心地对照恩格斯写于1859年之后的著作与马克思毕生著作的关系，并彻底地审视他们共识中

的任何相互交流的两方面的时候。大多数学术注释者目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这种论述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与政治理念的迟缓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归因于懒惰的作家们做出了简单的选择。

第二个观点认为，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恩格斯可能被巧妙地忽略了。重要的是，没有人试图颠倒这个程序，事实上，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大量注释的内在缺陷是值得仔细审视的线索，为注释者所不知的是，来自于这些注释的唯物论对解读马克思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马克思著作的恩格斯修订版得到了广泛地传播，这个事实也是必须承认的。

第三个观点最为有趣，在学术圈子里也最为流行：与 1859 年之前相比，晚期马克思被认为是采用了恩格斯在同一时期采用的“决定论”的观点，或者说得轻一点，晚期马克思不言而喻地同意、倾向或容忍了恩格斯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惊人之处在于，没有用来证明它的实际的证据；关于其真实性仅仅是一种断言，而这并非从来就是自明的。这个观点也就很难站住脚，因为证据的缺乏成为重负，怀疑论者肯定要附加提出似乎有道理的唯物主义（因此放弃她或他的观点）来对此加以驳斥。

尽管注释者通常没有详加表述，但这个“决定论”的观点涉及马克思很多真正重要的细节：其一，晚期马克思的“决定论”著作与其早期的“哲学的”或“人学的”著作是不一致的；其二，晚期马克思采用的“决定论”本身也是不一致的，因为对其晚期著作的审视揭示了与其早期唯物主义的重要连续性。马克思的双重分裂绝不是简单地对抗的，但是也经常摆在读者们面前，他们因为似乎有道理的、心理学的或其他什么问题而感到困惑。此外，这个观点事实上只是提出而非争论，即仅仅含糊地关注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写于危急关头的著作的观点。关于这种决定论本身的明确阐述以及这是否是一个例证，都是不清楚的。因为这种含糊使得对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似与差异的梳理的前景暗淡无光，读者们为此回顾《共产党宣言》以及更早的著作，这几乎让注释者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一旦这种关注发生变化，恩格斯晚年所持观点的原则实际上就变得模糊了，马克思艰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才真正得到公认，因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研究及其重要的理论阐述在于他所精辟阐述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根据恩格斯的自然科学发展规定（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他将自然科学拓展为（潜在的）普遍范畴，引人注目的、偶然的，特别是关心法的确立的范畴。因此，恩格斯被视为他假设的地位——马克思平等的合作者——被理所当然地归于这样的角色：“科学的”理论家。这两个“结论”都需要审视；无论是恩格斯的话还是其他注释者的话都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正确。此外，

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估计暗示了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如果我们以恩格斯的哲学支持马克思的批判，以他的决定论支持马克思的“指导线索”，并以他的解释语境支持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当恩格斯提出观点的时候，那么，谁是真正的“第一小提琴手”？

第1章

不顺利的开始



1842年11月，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首次会面，当时，马克思24岁，恩格斯年仅22岁。虽然那次的会面并不成功，但是，他们之间伟大的思想合作还是在时隔一年多之后正式开始了。

在考察任何一组思想关系时，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其中每一个成员在会面相识之前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以便理清：他们带给对方哪些思想资源、他们共同的经历和思想是什么以及之后他们一起完成了什么工作。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而言，很多事实还需要进一步阐明：他们不顺利的初次会晤，以及他们持续了39年的合作关系的基础——这一合作关系一直持续至马克思去世才结束。

我们必须转向研究恩格斯的思想产生和发展状况以阐明马克思在1842—1844年间的思考转变。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早期恩格斯没有受到像马克思那么严厉的审查，因此，我们开展工作相对容易得多。虽然恩格斯当时已经是一个比马克思更为资深、发表作品流传更为广泛的作家，但是，他还是十分希望得到身为总编和辩论家的马克思瞩目——马克思是当时在莱茵地区倡导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的首席人物。从他们第一次不顺利的会面到真正建立牢固的友谊前的这段时间里，恩格斯所作的相关工作受到马克思的关注和赞赏。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后来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并投身到了与恩格斯充满激情的合作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也由此开始。

在马克思24岁前，虽然他的政治路途很辉煌，但是，这实际上与他的家庭背景并不相称。他的父亲是一位开明律师，经济上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但并不富裕；喜爱并崇尚传统艺术和科学并对之颇有见地；尽管他反感烦琐的宗教事务，却一直是位有神论者。马克思受到以传统经典和自由主义艺术为基础的正统教育。他的父亲希望他读大学，然后找一份工作。但是，马克思却没有如他父亲所愿，而是选择了哲学和历史。他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逐步发展成为关于社会主义、无神论和革命的理论——这个发展路径就如18世

纪 90 年代最激进的法国革命者一样。

虽然黑格尔逝世于 1831 年，但是他的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马克思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通过黑格尔的著作了解 18 世纪 90 年代激进法国革命者们的思想并深受濡染。反动保守主义者和自由理想主义者都能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根据。马克思投身到了激进的阵营中。由于马克思在政治上的主张，做一位哲学教授对他而言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只能通过新闻业营生。自由主义报业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马克思的报纸——《莱茵报》——不得不艰难地周旋于市民支持者和持各色政治主张的供稿者之间。马克思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接受这样的挑战的人。但是，即便马克思辩才卓越，这份报纸的寿命也仅仅多维系了五个月。1842 年 11 月底，马克思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恩格斯，当时正是马克思做《莱茵报》总编辑期间，而恩格斯则是一个于 1842 年 4 月开始向《莱茵报》投稿的普通供稿人。

恩格斯的家庭背景与马克思不同。经济上，他的家庭以商业营生；思想上，他的家庭更趋保守而非自由；信仰方面，他们是虔诚的信徒而非与信仰貌合神离。恩格斯在德国首批工业化的地区之一——伍珀河谷长大。从他的曾祖父开始，恩格斯家族就已经是工厂主。恩格斯成长于虔诚主义的家族氛围中。他们被极端的新教派思想统治着，沉着习性的培养和读经盛极一时。虽然在文法学校中还有些许理性主义的影子，但是，整体而言，虔诚主义的教育并非启蒙智慧式的。恩格斯 16 岁时离开了文法学校。此时的他，已经具备良好的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德文素养。恩格斯并没有继续读大学，而是从事家族事业。一年之后——大约是 1838 年 7 月至 8 月，恩格斯到不来梅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正是在那个时期，还不满 18 岁的恩格斯成为一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并且他一度抱怨一位“完全破坏了诗的（1）主要思想，（2）连贯性”^① 的主编。恩格斯在给学友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一发现诗有了改动，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② 所谓的“主要思想”实际上就是将贝都英人，甚至将处于目前情况下的贝都英人（“他们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今天是为了挣钱，才在这里跳跃登场”^③，作者注），与他们穿着“巴黎式的礼服”^④ 的读者作对比——很明显地，恩格斯鄙视后者。另一方面，恩格斯对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7 卷，9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同上书，95 页。

③ 同上书，97 页。

④ 同上书，99 页。

身的才能做了批判式的评价：“我还要让我的诗在杂志上发表，因为别的青年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即使不比我更蠢，至少也是跟我一样蠢的蠢驴，而我这样做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德国文学的水平。”^①

恩格斯还对19世纪30年代“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倾注了同样的鄙视之情。恩格斯认为卡尔·谷兹科——《德意志电讯》的编辑——可以算是“青年德意志”运动中最明事理的人，他曾写道：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②。第二年春，恩格斯转而关注更为严肃的事情，他在1839年2月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写道：“刚才我在《电讯》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巴门传教士温克勒诗作的文章……那里所发表的东西，除了说教以外，起码都是些胡言乱语。”^③“宗教上的东西”，他继续写道，“通常都是胡说八道”^④。同年3月，恩格斯完成了他早期最成功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并发表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1839年3/4月期上。

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将他的家乡描述为“蒙昧主义者的锡安山”^⑤，并将正统基督教统治、管理低效的政府、糟糕的建筑、工业污染、贫困和剥削展现在同一个画面中。从排污管中流淌出来的鲜红的伍珀河水，带着读者的视线穿越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恩格斯将工业化影响下的工人生活和“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民众的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生活”^⑥作了对比，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谷区工人。虽然恩格斯对德国其他地区的了解尚显天真——至少表述上还显得稚嫩，但是，他对伍珀这个他所熟知的地区已经作了十分直观和有力的描述：



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唱着他们的歌曲，但总是一些从醉汉嘴里哼出的最粗俗最下流的歌曲；那些唱遍整个德国而且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民歌，在这里从来连一支也听不到。所有的小酒馆都挤满了人，特别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11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95页。

^② 同上书，121页。

^③ 同上书，127~128页。

^④ 同上书，12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⑥ 同上书，43页。